


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成果

# 20世纪浙江钢琴艺术 发展研究

陈 晶 著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ZHEJIANG PIANO ART  
IN THE 20TH CENTURY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浙江钢琴艺术发展研究 / 陈晶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0. 6  
ISBN 978-7-308-20225-1

I. ①2… II. ①陈… III. ①钢琴—艺术—研究—浙江 IV. ①J624.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083490 号

## 20 世纪浙江钢琴艺术发展研究

陈 晶 著

---

责任编辑 吴伟伟 weiweiwu@zju.edu.cn  
文字编辑 陈逸行  
责任校对 严 莹  
封面设计 雷建军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广东虎彩云印刷有限公司绍兴分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1.75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20 年 6 月第 1 版 202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20225-1  
定 价 68.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com>

## 前 言

我与此书或许早在幼年时就已结缘。20世纪80年代,我也曾是一名琴童,经历了国内的“钢琴热”风潮。但在交通、信息都不那么发达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想要取得钢琴演奏的“真经”,相比较如今的琴童,要辛苦却也“幸福”得多。那时为拜访名师,我背着干粮往返于杭州、上海和南京无数次,除了乘坐火车外,还需辗转多趟公交车。而让我深感幸福的是,这艰辛的求学之路培养了我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使我无惧失败,不畏前路。在老师们的授课过程中,他们一丝不苟的认真教学让我感受到了老一辈钢琴教育家们对钢琴教育事业的热爱。老师们常常追忆自己学习钢琴过程中的酸甜苦辣,年少的我总是怀着崇敬的心情聆听着,有时候甚至还会好奇地追问,或许就在那个时候,我的心中已经埋下了一粒种子——期望有一天可以挖掘老一辈钢琴家们更多的珍贵事迹。

自工作以来,通过钢琴演奏与教学,我对钢琴艺术理论研究的热情愈加浓厚。钢琴艺术产生于欧洲,早在17世纪,古钢琴就已传入中国,然而钢琴演奏艺术在中国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发展。直至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钢琴演奏艺术才在中国真正得以生根、发芽,尤其是在20世纪,钢琴作为西方音乐与中国音乐沟通交流的主要媒介之一,在中国得以蓬勃发展。时至今日,钢琴艺术在中国经过了100多年的酝酿、发展、融合,渐渐形成了中国钢琴艺术的独特魅力,在演奏、教学、创作等各个方面,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那么,在过去的100余年间,西方钢琴艺术究竟是如何与中国文化发生物理碰撞和化学反应的呢?中国钢琴艺术具体又是怎样形成自己独特的音乐文化的呢?

在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把目光投向了浙江。首先,浙江有着千百年的文化积淀,人杰地灵,人才辈出,在浙江人世代代务实创新的努力下,浙江成为一片独具一格的人文沃土。其次,浙江有着得天独厚的教育环境和

优越的地理位置,浙江这片热土为中国的钢琴教育事业输送了一代又一代杰出的钢琴演奏家和教育家。正是浙江人民对钢琴艺术的这份执着与热情,才营造出了如此欣欣向荣的钢琴教育生态。最后,浙江是我的出生地,我对其有着特殊的情感,浙江是我钢琴演奏生涯的起点,也将成为我研究中国钢琴艺术理论的起点。

本书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叙述了 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钢琴艺术在浙江的发展,主要梳理了浙江教会学校和宁波“钢琴帮”的历史源流。第二部分叙述了 20 世纪上半叶浙江钢琴艺术的发展,从蔡元培先生培养了李叔同等钢琴教育家这一历史事件入手,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上海国立音乐院(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杭州弘道女中、浙江湘湖师范学校等为研究重点,梳理、挖掘和分析了浙江钢琴艺术在这些学校机构教育活动中的传承。这一时期,浙江的钢琴教育主要集中在学校教育,还没有普及至社会教育或者家庭教育。第三部分叙述了新中国成立后浙江钢琴艺术的发展,在“钢琴热”风潮的鼓舞下,一大批有志进行钢琴教育探索的钢琴教育家充满激情、任劳任怨,为浙江的钢琴教育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这一部分主要介绍了他们是如何在浙江辛勤开垦出各自的钢琴园地的。第四部分主要梳理研究了浙江省钢琴家与教育家的经历和成就,分为 20 世纪浙江籍钢琴演奏家与教育家、辛勤耕耘在浙江琴坛的钢琴教育家以及浙江钢琴界新秀三个方面,通过挖掘他们的钢琴艺术人生,窥探浙江钢琴艺术的传承与发展脉络。

浙江省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书梳理了浙江钢琴教育的发展历史,探究了浙江钢琴教育领域的重要人物,挖掘了浙江重要的钢琴教学理念与思路,研究了浙江钢琴教育发展的策略,对浙江省文化建设和对外文化交流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最后,感谢在本书成书过程中给予我帮助的各位师长、前辈、家人。感谢各位读者有兴趣阅读本书。由于本人才疏学浅、能力有限,未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恳请各位读者批评和指正。

陈 晶

己亥年春于湘湖畔之缘圆斋

# 目 录

<b>第一章 钢琴艺术在浙江</b> .....	1
第一节 钢琴传入中国.....	1
第二节 浙江早期学校与音乐教育.....	3
第三节 宁波“钢琴帮”沪上始发轫 .....	10
<b>第二章 浙江钢琴教育的启蒙(1900—1949)</b> .....	13
第一节 浙江音乐家谱系 .....	13
第二节 浙江音乐教育之父——蔡元培 .....	15
第三节 浙江钢琴教育启蒙者——李叔同 .....	17
第四节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钢琴教育及其传承 .....	20
第五节 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与浙江音乐教育家 .....	31
第六节 专业音乐教育的启蒙者——萧友梅 .....	39
第七节 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的钢琴教育与李树化 .....	42
第八节 浙江其他学校的钢琴教学 .....	54
第九节 小 结 .....	61
<b>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后的浙江钢琴教育</b> .....	63
第一节 浙江省机构钢琴教育 .....	63
第二节 浙江省社会钢琴教育 .....	69
第三节 小 结 .....	99
<b>第四章 浙江省钢琴家与教育家群体研究</b> .....	101
第一节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钢琴艺术 .....	101

2 20 世纪浙江钢琴艺术发展研究

第二节	浙江籍钢琴演奏家与教育家·····	105
第三节	辛勤耕耘在浙江琴坛的钢琴教育家·····	124
第四节	浙江钢琴界新秀·····	144
附录	20 世纪浙江钢琴作品选·····	177
后记	·····	180

# 第一章 钢琴艺术在浙江

## 第一节 钢琴传入中国

西洋乐器传入中国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公元 1582 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在广东肇庆建立了中国第一座天主教堂,教堂里面便摆放着一座“西洋乐器”：“他们也羡慕我们的乐器,他们喜欢它那柔和的声音和结构的新颖。”<sup>①</sup>这件乐器吸引了许多中国人,可惜史料没有办法证实这到底是什么乐器。

1601 年,利玛窦再次来到北京,觐见明神宗,贡献贡品数款,其中第九款为“大西洋琴一张”<sup>②</sup>。乾隆十二年(1747),官修、纪昀校订的《续文献通考》对这架古钢琴的外形进行了细致的描写：“明万历二十八年,西洋人利玛窦来献其音乐。其琴纵三尺,横五尺,藏棊中弦七十二,以金、银或链铁为之弦。弦各有柱,端通于外,鼓其端而自应。”从文字记载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利玛窦当时献给明神宗的古钢琴的外形和结构,可以断定此琴为当时欧洲的击弦古钢琴(clavichord)。<sup>③</sup>

这是关于古钢琴传入中国的时间、地点、种类等信息最为权威的记载。古钢琴传入后主要为宫廷所用。<sup>④</sup>

利玛窦所贡献的这架钢琴引起了皇室的兴趣。其中,有 4 名太监奉命前去拜庞迪我<sup>⑤</sup>为师学琴,学琴的目的主要是将来能够在皇帝面前演奏古

---

① 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第 237 页。

② 陶亚兵:《中西音乐交流史稿》,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年,第 36 页。

③ 陶亚兵:《中西音乐交流史稿》,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年,第 39—45 页。

④ 陶亚兵:《中西音乐交流史稿》,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年,第 39—45 页。

⑤ 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Diego do Pantoja),曾经学习过古钢琴,成为第一个宫廷外籍音乐教师。

钢琴。这标志着西方(古)钢琴艺术正式传入中国,并成为钢琴演奏与教学的首个案例。音乐课持续了一个月,4名太监每人学会了1首乐曲。由于太监们的需要,利玛窦将8首赞美诗编译成册,命名为《西琴曲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我国出现的首部钢琴教学曲集。

明崇祯十三年(1640),德国籍传教士汤若望<sup>①</sup>进宫安置日晷之时,偶然见到古钢琴,并弹奏一曲,引得崇祯帝的兴趣,崇祯帝令其修琴和制新琴。同时,汤若望还撰写了一本《钢琴学》,主要介绍了钢琴的构造及演奏方法等。可惜的是,此书已失传,无据可查。

康熙帝在位时,陆续有外国的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精通西洋乐器,传授西方音乐。康熙帝亦乐于演奏西洋乐器,其宠臣高士奇(1645—1703)在《蓬山密记》中记载道:“十八日午后,召至渊鉴斋……闲谈许久。说及律吕如何探讨,颇得其要。有内造西洋铁丝琴,弦一百廿根,上亲抚《普庵咒》一曲。”<sup>②</sup>由此可见,西洋古钢琴在当时的宫廷中具有一定的普及性,包括康熙帝在内的君主与臣子,有数人可以演奏钢琴,并且可以将钢琴洋为中用,演奏中国音乐。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虽然自1601年第一架钢琴(称为“键盘乐器”更为合适)传入中国后,便出现了相应的教学活动,出版了演奏曲集,但是其只存在于皇室宫廷中,没有流传至民间。

第二,1601年以后,为数众多的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大多数精通西洋音乐,在宫廷进行了一系列的音乐演奏活动,使西洋音乐和西洋乐器在宫廷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普及。

第三,在康熙帝时期,已经出现了用钢琴演奏中国音乐的先例,标志着(古)钢琴开始民族化,古人在当时就已开始尝试用钢琴进行创作与演奏。

第四,利玛窦1601年进贡的击弦古钢琴在最初曾受到欢迎,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被冷落。因此这个时期的(古)钢琴音乐演奏与教学不具有持续性<sup>③</sup>,更未成体系,西洋音乐活动在这个时期被搁置。

<sup>①</sup> 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德国籍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在华期间参与编译《崇祯历书》,对音乐颇为精通。

<sup>②</sup> 陶亚兵:《中西音乐交流史稿》,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46页。

<sup>③</sup> 陶亚兵:《中西音乐交流史稿》,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60页。

## 第二节 浙江早期学校与音乐教育

1840年,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清王朝封闭的大门,中国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战争中,晚清政府屡屡挫败。在一次次的挣扎中,进步人士主张向西方学习,开展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部分国人开始认识到需要西学器物、科技、工艺、文化以及语言等,通俗地说,就是要通过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语言,让自己变得更强大,从而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林则徐是近代“开眼看世界第一人”,他一方面抵抗西方列强入侵,另一方面则认识到西方“器物”的先进性,筹集资金、购买材料,仿制西方之战舰。同时,林则徐主持编译了世界地理著作《四洲志》和史书《华事夷言》。魏源<sup>①</sup>所主张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他提出要向西方学习,“师夷”指的是学习西方在军事技术上之长处,“制夷”指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克敌制胜。

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内容主要经历了从“器物”层面(魏源等有识之士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受其影响开展的洋务运动)、“制度”层面(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文化”层面(新文化运动)三个阶段的转变。一方面,国门被迫打开后,在外部因素的促成下,洋人所办的教会学校不断兴起。兴办教会学校的目的是传播基督教文化,培养本地传教人士,但实际上,这也开启了近现代中国人学习西洋文化的新篇章,教会学校教授的科目包括天文、地理、数学、西方音乐等。另一方面,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运动加速了西学东渐的过程,洋务派纷纷在各地建立新式学堂,部分传统书院的教学内容也出现了增加西学内容的倾向。

洋务派后的维新派,又是一个重要的思想流派。其代表人物康有为数次上书光绪皇帝,从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提出见解。在文化教育方面,康有为提出“开民智”“兴学校”“废八股”的主张。在中国近代音乐教育

---

<sup>①</sup> 魏源(1794—1857),晚清著名思想家,作为林则徐的挚友,他和林则徐一样,坚决主张“开眼看世界”。其所著的《海国图志》是中国近代认识和了解海外世界的第一书,系统介绍了西方的史、地、科、文等知识,在当时被认为是介绍西方世界知识的“百科全书”。

史上,第一次提出在学校开设音乐课程主张的,便是康有为。他认为“广开学校为最要”,只有学习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学制,才有可能不断改进和完善清朝的旧式教育,不仅仅局限于旧式“四书五经”,而应当增设“文史、算术……歌乐”。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流亡日本,感受到了日本音乐教育对人们的重要影响。此后,梁启超又开始大力提倡新式音乐教育,他认为:“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今日不从事教育则已,苟从事教育,则唱歌一科,实为学校中万万不可阙者”。<sup>①</sup>

### 一、近代浙江学校的西方音乐教育

近代浙江学校的创办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 (一)教会学校时期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被迫开通了五个通商口岸,其中一个为宁波。温州和杭州分别在1876年的《中英烟台条约》和1894年的《马关条约》中被开通为通商口岸。一些西方传教士来到浙江,在浙江创办了教堂12所、传道所453处,其中教职人员426人,教徒25126人<sup>②</sup>。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英国传教士奥尔德西(Miss Aldersey)来到宁波,创办了浙江第一所洋学堂,这也是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次年7月26日,美国长老会海外传道部宁波差会在浙江宁波创办了崇信义塾(Ningpo Boys Boarding School),传教士韦理哲(R. Q. Way)被任命为首任校监(principal),传教士麦卡蒂(D. B. McCartee)为协理(assistant)。崇信义塾是浙江第一所男子学堂,学堂课程内容以圣经教义为主,还包括历史、地理、数学、科学、语言、音乐、体育。其中音乐课程在创校之初就开设了,学习音乐的目的是教学生演唱赞美诗,差会为此请美国长老会海外传道部购买乐

<sup>①</sup> 孙继南编著:《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纪年(1840—2000)》(新版),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第15页。

<sup>②</sup> 杜志明:《清末浙江新式教育在设定框架下的定量、定性比较研究(1902—1911)》,博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2015年,第14页。

器。<sup>①</sup> 宁波差会非常重视教材建设, 组建专门委员会挑选合适的书籍作为教材, 同时传教士们还根据教学需求自编教材。《赞神乐章》(见图 1-1)、《圣山谐歌》(见图 1-2) 两本五线谱赞美诗是当时学校的音乐教材, 分别出版于 1856 年和 1858 年。<sup>②</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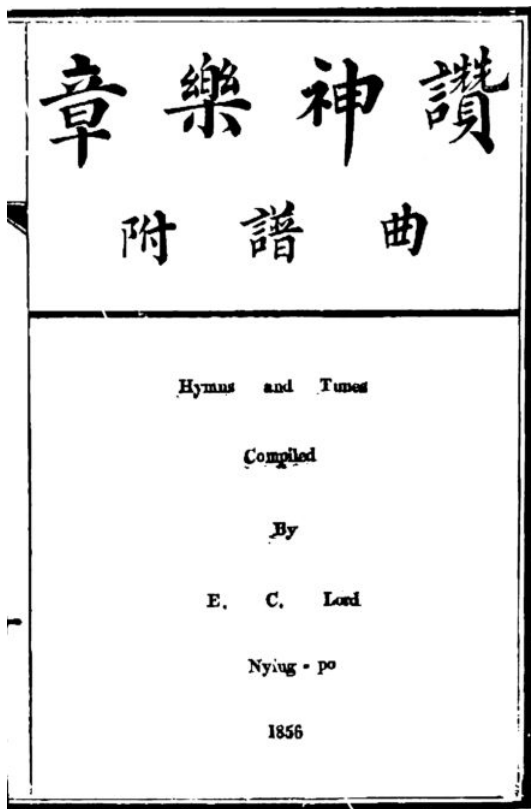


图 1-1 赞美诗集《赞神乐章》<sup>③</sup>

《赞神乐章》的作者是罗尔梯(E. C. Lord), 该书可能是中国最早出版的中文五线谱教材。<sup>④</sup> 其内含 25 首赞美诗, 均配有宁波方言翻译。

① 孙继南编著:《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纪年(1840—1989)》, 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0 年, 第 2 页。书中提到: 崇信义塾, 1867 年迁往杭州, 改名“育英义塾”, 1914 年改为“之江大学”。

② 田力、马先红:《宁波崇信义塾史略》,《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4 年第 5 期, 第 57—63 页。

③ 图片来自宫宏宇:《基督教传教士与宁波早期音乐教育》,《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6 年第 1 期, 第 45 页。

④ 龚纓晏编著:《浙江早期基督教史》, 杭州: 杭州出版社, 2010 年, 第 206—209 页。

《圣山谐歌》由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应思理(Elias B. Inslee)编写。该书共收录 113 首乐曲,同样配有中文和宁波方言翻译。

The image shows a page from a music book. On the left is a musical score for a piece titled 'Nuremberg'. The score is written in Western staff notation with a treble clef and a key signature of one sharp (F#). It consists of two systems of music, each with a vocal line and a piano accompaniment line.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there are two columns of Chinese text. The top column contains the lyrics in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 bottom column contains the lyrics in the Ningbo dialect. Below the Chinese text, there is a section titled '1. TSING-JING DJÜN-NENG,' followed by several lines of text in a phonetic transcription system, likely representing the Ningbo dialect lyrics.

图 1-2 《圣山谐歌》<sup>①</sup>

在崇信义塾任教的音乐教师中,有一位传教士名叫海伦·寇恩·倪维思(Helen S. Coan Nevius)(见图 1-3),她受过一定的音乐教育,善于用理论联系实际,挖掘中国孩子的特点,制定出教授西方音乐的有效方法。从自然音阶、自然音程、简单乐句、多声部音乐,节奏节拍等各个方面,循序渐进、因材施教,提高学童们识谱和演唱多声部音乐等一系列能力。

除了西方传教士在宁波进行早期的音乐教育活动,一些信奉基督教的中国人也加入音乐教育活动中,比如中国盲人阿格尼丝·居茨拉夫(Agnes Gützlaff)<sup>②</sup>(见图 1-4)曾在 1855 年至 1861 年在浙江宁波教授音乐,并为宁波的英国安立甘教会组建唱诗班。阿格尼丝·居茨拉夫组织的音乐活动不

<sup>①</sup> 图片来自宫宏宇:《基督教传教士与宁波早期音乐教育》,《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6 年第 1 期,第 46 页。

<sup>②</sup> 中国盲人阿格尼丝·居茨拉夫在 5 岁半的时候被从普鲁士来中国的传教士、基督教路德会宗牧师送往英国。1842 年 1 月 3 日入读伦敦盲人学校,1855 年回到中国,在宁波进行西洋音乐的教学工作。

仅仅局限于教会唱诗班,她还利用自己演奏钢琴和风琴的能力服务于教会。



图 1-3 海伦·寇恩·倪维思<sup>①</sup>



图 1-4 中国盲人阿格尼丝·居茨拉夫<sup>②</sup>

在随后的几十年中,教会学校陆续覆盖全省各个地区<sup>③</sup>。湖州湖郡女塾也开设了琴科,不光把钢琴作为主要的教学工具,还专门开设了钢琴课程,让中国学生选修。<sup>④</sup> 教会学校开设了圣经、国文和算术等课程,同时涉及世界历史地理、音乐、体操等内容。学校还创办了合唱队(以赞美诗、唱诗班为主)、辩论队等较为丰富的社团,全面提升学生的知识素养、身体素质和实操能力。其中西学、数学、音乐这三门课程,开创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先例。

浙江这一系列教会学校的创办从主观上来说是为了传教,为列强培养神职人员,但是从客观上来说传播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培养了一批早期具有先进文化知识和适应中国社会需要的人才。此外,教会学校和中国传统的旧式学堂有巨大的区别,后者主要教授四书五经等古文字文学和政治领域的通识,而前者包含了天文、地理、音乐、体育等各种不同的学

<sup>①</sup> 图片来自宫宏宇:《基督教传教士于宁波早期音乐教育》,《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第43页。

<sup>②</sup> 图片来自宫宏宇:《基督教传教士与宁波早期音乐教育》,《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第41页。

<sup>③</sup> 郑生勇:《教会学校对浙江教育近代化的影响》,《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第184—187页。

<sup>④</sup> 乔馨:《中国早期钢琴音乐的文化阐释——输入、选择与融合》,《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第237—242页。

科,不仅打开了国人的眼界,提高了国人的素质,而且提高了中国的教育水平,为 20 世纪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sup>①</sup>。浙江省教会学校发展历程如图 1-5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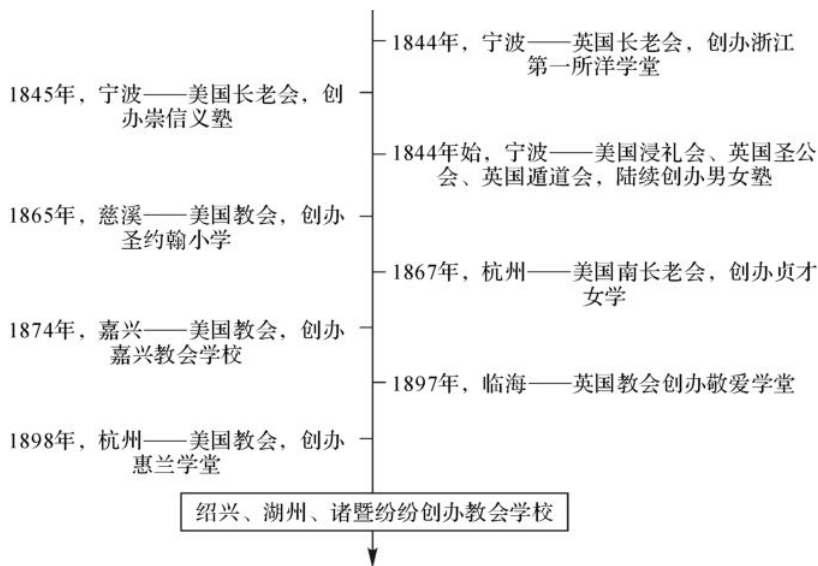


图 1-5 浙江省教会学校发展历程<sup>②</sup>

宗教活动中的音乐礼拜、宗教歌咏等西方音乐活动是当时的教会学校不可或缺的活动,教会还会举办专门的音乐会。浙江湖州的湖郡女塾等全国范围内的许多教会学校都开设了以学习钢琴为主的课程,培养了许多精通西方音乐的国人。<sup>③</sup>

因此,无论是被动输入还是主动学习,教会学校为当时浙江的新事物、新文化、新科技的传播提供了很好的媒介作用。笔者认为,这样的环境,为日后钢琴这种西洋乐器及其艺术在浙江的扎根奠定了良好的环境基础。

## (二) 新式学堂时期

第二个时期的学校则是国人为了“开眼看世界”,学习西方的先进知识,达到“以夷制夷”的效果而设立的新式学堂。洋务运动之后,国人开始意识到“开眼看世界”、学习精进西方文化的重要性以及传统中国教育方式的不

<sup>①</sup> 吕莹:《教会学校与近代宁波教育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宁波大学,2008年,第16—37页。

<sup>②</sup> 张健:《晚清浙江教育近代化历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3年,第14—15页。

<sup>③</sup> 汪毓和编著:《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年,第18—19页。

足与弊端。浙江人士同样也认识到诸类问题。萧山县(今杭州市萧山区)汤寿潜在其《危言》中提到“抑中国之大,人才之众,而所教非所求,所求非所用,所用非所习欤”;平阳县宋恕在《六字课斋卑议》中批评了传统教育的弊端,比如“科举取材首重小楷,致使全国士子‘疲心手于点划,掷光阴于临摹;器求精佳,或岁费中人之产;形尚滞固,并大失书家之意’”<sup>①</sup>。甲午战争之后,国内掀起了戊戌变法,开始认识到开办学校的重要性,大规模创办了新式学堂,形成了包括小学堂、中学堂、大学堂等的完整教育体系。其中浙江高等学堂(由求是书院改制而来)开设了音乐课,老师是毕业于日本音乐学校的日籍教员元桥义敦。

1899年,杭州知府林启创立了养正书塾(1901年该书塾更名为杭州府中学堂),最初开设了国文、小学(说文)、历史、地理、修身、经学、算学,后又增设格致、体操、英文、音乐等课程。<sup>②</sup>

1905年9月23日,革命党人徐锡麟、秋瑾等创办了大通学堂,学堂成立于绍兴,开设英文、国文、日文、历史、教育、琴歌等14门课程,对音乐课较为重视,聘请许之华、张光耀、顾延坤为琴歌教师。<sup>③</sup>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首先,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浙江作为沿海省份,其宁波、温州、杭州等城市先后被迫开埠,西方传教士在浙江兴办教会学校,虽然主要目的是传播基督教,但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西方音乐在浙江的传播。

其次,戊戌变法以来,先进人士都意识到兴办学校的重要性,中国需要“开眼看世界”。于是,浙江涌现出了一大批新式学堂,兼学“中学”和“西学”,培养了许多人才。无论是在教会学校还是新式学堂,其学生都学习了西方先进的科技、军事、天文、地理、算术等各种不同门类的学科知识,当然也包含了音乐课,教会学校的音乐课以唱诗班唱赞美诗等为主,新式学堂则以唱歌课为主。当然,此时的音乐课并没有被置于重要的位置,主要原因是:传教士的重点是传教,学堂的重点是“制夷”。

最后,虽然从史料记载来看,在1840—1910年这70年里,中国并没有

① 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8—17页。

② 孙继南编著:《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纪年(1840—2000)》,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2—13页。

③ 孙继南编著:《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纪年(1840—2000)》,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8页。

大力发展音乐教学,更不用提及对钢琴艺术的发展了,但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其鼓励国民大力学习和吸纳西方文化的氛围,为日后西方艺术,特别是西方钢琴艺术在浙江乃至中国土地上的落地、发展,奠定了强有力的环境基础和文化基础。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教会学校是国人接触西方音乐最早的场所<sup>①</sup>,一些教会学校开设琴科等是在国民学习西方音乐的萌芽期,其也成为日后传播钢琴艺术的润滑剂与催化剂。

### 第三节 宁波“钢琴帮”沪上始发轫

宁波人的勤劳、智慧,宁波的天时、地利、人和,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制琴师,日后的宁波籍钢琴家亦走向全国,钢琴事业在宁波本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形成了钢琴界的“宁波帮”,而这个宁波“钢琴帮”的形成,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 70 年代的“Moutrie”。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各地都出现了大大小小的教堂和教会学校,上海在西洋音乐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创立于 1861 年的上海清心女中在当时已经开设了音乐课,钢琴这件乐器对一些关注西洋乐的人来说已不能说“闻所未闻”。19 世纪 70 年代,英国商人谋得利(Moutrie)开设了上海首家琴行——“老公茂”洋行,谋得利将大批英国钢琴等西洋乐器进口到中国,自此,西洋乐器的销售、制造和调律等业务自然而然地在中国落地生根,并逐渐发展壮大。因西洋乐器在中国的繁荣发展,仅靠从英国进口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增加的市场需求,也无法满足“老公茂”洋行业务拓展的需求。于是,谋得利继续开拓,准备在中国生产钢琴,以节约成本,增加利润。1886 年,谋得利上海钢琴有限公司在上海闸北宝山路正式挂牌成立,并以高薪聘请了宁波工人毛文正,由毛文正从宁波招募了 20 余名同乡前来一起“打拼”,这批宁波工人便是宁波“钢琴帮”的起源。

然而谋得利上海钢琴有限公司对其钢琴制作、调音等核心技术执行了严格的保密制度,宁波巧匠们并不能真正学得这些专业的核心技术,因此他们在辛苦工作之余,还夜以继日地“偷”学着钢琴修造的关键核心技术。在

---

<sup>①</sup> 陈海燕:《中国近代音乐教育转型的多维向度》,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6 年,第 23—26 页。

宁波“钢琴帮”的创始人们掌握和积累了较为丰富的钢琴制造与维修经验后,一些有足够积蓄的宁波匠人便开始尝试脱离谋得利上海钢琴有限公司,独立运作私人琴行。

宁波镇海人黄定海于 1890 年率先自立门户,在其余几个宁波匠人的协助下,创办了中国人独立运营的第一家钢琴行——“祥兴琴行”,开展了仿制钢琴、修琴、调音等一系列基础钢琴类业务。之后,宁波北仑人程定国于 1911 年开办了“永兴琴行”,他的三个儿子分别经营上海南京路、陕西南路、四川北路的三家分行。此外,还有顾杏春开办的“罗班臣琴行”,顾阿智、贺春生、高葆仁合伙经营的“精艺琴行”,高葆仁、贺春生开设的“上海琴行”等等,在此后的 50 多年间,上海由宁波人开设的琴行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在上海开办的宁波琴行都是家庭作坊式的,有着经营规模小、经营方式灵活等诸多特点;且当时的琴行无法独立完成整架钢琴的制造,所有开展的钢琴类业务都与琴行实体密不可分,钢琴制造与维修、服务等相关业务捆绑式运营,保障了这些琴行在早期可以迅速发展,获得可观盈利。

宁波“钢琴帮”除了占据上海钢琴市场的半壁江山外,还开始东渡、南下,开辟新的钢琴市场和钢琴类业务。19 世纪 90 年代初,宁波人李佐庭先后在日本东京、神户、横滨等地开办琴行,还加盟参建了横滨钢琴厂,即现在的雅马哈钢琴厂前身。20 世纪 30 年代,宁波人陆廉卿在中国厦门创办了华成琴行,李孙文英在中国香港创办了通利琴行,王阿明在新加坡创建了南兴琴行……

随着钢琴产业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宁波技师开始探索独立生产整架钢琴的方法。宁波人林炳炎早年在上海罗班臣琴行做过学徒,在此期间,他研制出了钢琴制作的技术核心——击弦机。1940 年,林炳炎被重庆国立音乐学院聘为特级钢琴技师;1942 年,因教育资源稀缺,教育部部长兼该院院长陈立夫委托林炳炎研制钢琴;1973 年,历经种种艰难,我国第一架钢琴终于创制成功,标志着中国人具备了独立生产整架钢琴的能力。宁波“钢琴帮”技艺高超、经验丰富、不断探索、薪火相传,为中国的钢琴制造业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为西洋音乐在中国的发展添上了不可小觑的浓墨重彩的一笔。<sup>①</sup>

在宁波“钢琴帮”的钢琴修造领域,周大风亦深受“福泽”。1938 年,周

<sup>①</sup> 杨建森:《中国钢琴文化探源》,《中国音乐》2008 年第 2 期,第 154—158 页。